

# 政海秘聞(二)

——從唐繼堯到龍雲 (本文插圖刊第134頁)

●后希鎧 (淡江大學教授。中國醫藥學院教授)

## 大廈將傾心儀英雄

唐繼堯在「會澤筆記」(唐爲雲南會澤人，當時有以鄉名爲「號」之習俗)中說：

「天下安，一賢者治之有餘；天下危，雖集多數英雄之力奔馳營救猶不足。故危國而生內變，距亡無日矣。」

「天下有道則見，天下無道則隱，聖賢也。天下有道則隱，天下無道則見者，英雄也。故治世多聖賢，亂世多英雄；英雄戡亂，聖賢飭治。吾願今日之中國，出一偉大之英雄，兼聖賢之德識才量，而以英雄之氣魄能力，以挽此大廈將傾之勢。」

從這些筆記裡，更可明白青年時代的唐繼堯，是如何盼望自己的國家，「出一位不「詰」「明哲保身」的真英雄，「挽此大廈之將傾」。

孫中山先生在唐繼堯的眼裡，正是一位足以戡亂，足以飭治的英雄聖賢，所以唐繼堯參加了同盟會。我們也可以這樣了解，當時的留日學生，親身接觸孫先生之後，不但不認爲他是「不識字的江洋大盜」，還認爲孫先生是一位英雄兼聖賢的時代舵手，紛紛加入「革命」，準備「建立民國」。

所以，留日學生之受孫先生影響，不過英雄所見略同，不會是唐繼堯獨具「慧眼」。反過來說，爲什麼要刻意汗馱唐繼堯？不以平常心去看人看事？除了現實政治之醜惡外，我實在無法歸咎於誰。

唐繼堯的「會澤筆記」裡又說：

「予年已二十餘矣，尙不能率中原子弟振揚國威，可恥者一。才不足以壓衆，德不足以服人，可恥者二。外患日深，而不以臥薪嘗膽之精神，從事振作，好逸惡勞，苟且偷安，可恥者三。此後加倍努力，刻刻自警。」

這種以天下爲己任的話想來不是軍閥之道，祇是一名留日學生感慨之詞。從正面去看，自然令人有「三十功名塵與土」的感受；但是，如果要談談心理背景，就不能不看看雲南的歷史和現代地理了。

我們可以用一句話來剖析雲南的歷史——明朝開國之後，中原子弟才大量在雲南落戶，生根，雲南也就普通中土化了。

明朝開國以前，元朝並不認同中原文化，儒家在「排名」順序中，還不如娼優，這是治史者人人都知道的史實。蒙古人並非先統一中國，而是吞滅大理國之後，才統一中國的。雖然蒙古人將雲南設爲中國行省之一，但它設「梁王」世襲統治。

換言之，雲南省是蒙古人的雲南省；所以，朱元璋一統天下，收復喪失「多代」的燕雲各州，蒙古人退出塞外，依然遙領雲南。朱元璋派去勸降的兩次使臣，先後被殺，明朝大軍三十萬人，才在傅友德、藍玉、沐英三人率領之下，佔領雲南落戶，先後又移植二百五十萬中原人到雲南落籍。

這些遠征雲南的中原人(外省人)，對中原來說，他們自是捍衛國疆的勇士。對雲南來說，他們是帶來中原文化的親和力。

在明代開國以前，推演上去，蒙古人是武裝入主雲南；宋人自顧不暇，一任大理國偏安達三百年之久；大理之前的南詔，受不了唐朝楊國忠時代的朝官侮辱而獨立，並合吐蕃兵(西藏人)擊敗唐人，造成對立之勢。可以說唐、宋、元三

代，中原人對雲南的「關係」，實在不深。

唐以前的道喪文徵時期，三國分離時期，強漢時期，雲南都是處於遠人賓服的時代——遠人自遠人，不會與中原人一模一樣。明朝開國以來，情形就完全改觀了，連泰北山區的少數民族，都會說「雲南國語」（西南官話），可見雲南人不論漢夷，心懷祖國，已是共同的訴求，選用「火燒藤甲兵」時代的眼光去看雲南人，應該是誰的無知呢？

### 雪恥圖強振興軍力

唐繼堯在「會澤筆記」中說：

「聞教官談，甲午牛莊之役，日人殘殺男女老幼同胞之慘狀，令人氣憤填膺。所謂文明假面，自行揭除，吾爲日人之野蠻凶殘，尤爲吾同胞之生命賤於犬馬羞。嗚呼！吾尙不奮發圖強，以除此暴敵，爲吾枉死同胞一雪冤憤乎？學絕道喪，所賴以復興者，惟少數豪傑之士耳。」

這是留日時期的唐繼堯的筆記；可見唐繼堯也與一般雲南人一樣，心繫祖國，恥痛東三省同胞之被殘殺，並有雪恥復仇之心。認真說來，青年唐繼堯之心，也是全國同胞之心。

我們要了解的是——唐繼堯這名青年留學生返國之後，是不是跟大江南北，跟沿江沿海的青英，同具死國之勇，爲同盟會的理想而奮鬥呢？

唐繼堯在日留學，考察亡國後的韓國及越南這段期間，也是滿清政府受盡累戰累敗之辱，深懼亡國之禍，極思改革，銳意建立新軍的時候。也是光宣之際，丁振鐸、錫良、李經羲等人，以

清廷開明人物相繼督滇之時。因爲雲南毗鄰英緬法越，可以說強鄰壓境，禍至無日，不但外交上要有因應之道，「實力」上也要有阻嚇入侵的具體表現。所以，強化雲南的新軍實力，便是重要途徑。

中國的新軍（洋操隊）應該以「北洋系」最有實力，雲南所練的新軍（滿清國防軍），便是由北洋系軍人所主持。如靳雲鵬、曲同豐、鍾麟同諸氏，都是北洋系出身，主持滇省新軍。換言之，在滇的中央軍（清廷）都是北洋系掌握。唐繼堯不過是本地人加入中央軍系統而已。並非唐繼堯的祖上握有一方的兵權，然後由留學歸國的子弟去當「少帥」。

### 講武任教鼓吹革命

唐繼堯返國之後，在雲南「督練（兵）公所」參謀處擔任「提調」之職，又兼任雲南講武堂（軍校）教官；後來調任第十九鎮的「正參謀官」。雖然「終於」服務軍旅，但唐繼堯依然沒有「帶兵」。對孫先生這位英雄主張的「革命」來說，這名姓唐的留日武學生，還沒有搞到「實權」，還不能親身率兵推翻滿清政府。

唐繼堯爲什麼老幹「閒差事」呢？因爲他不是北洋系，留學時期又是胸懷大志的人，怕他鬧革命，因此不給他帶兵。

參謀雖然沒有帶兵，出主意操洋操却是參謀的本分。因秋操（閱兵）有功，唐繼堯才得擔任七十四標第一營的管帶（營長）。唐繼堯這位管帶，並不安分，公然對官兵大談民族主義。滿清

人並非笨瓜，當然設有情治單位，民族主義既然爲官家所忌，便「下了」唐繼堯的兵權，調他去講武堂任監督；唐繼堯又不能親自動手革命了。

唐繼堯並非一介武夫，既然釋了兵權，便對講武堂學生宣傳革命。我們必須知道，雲南新軍，也是擁護皇室的北洋軍系統；爲了地理上接近英法兩強，才在雲南開辦講武堂，就地取才；並沒有滇軍或地方軍的體系。唐繼堯到雲南講武堂任職，鼓吹革命，並不是地方勢力反對清廷，而是鼓動學生，參加建立民國的革命運動。因爲他是雲南人，雲南講武堂又就地招生，自然多是雲南人。事實上講武堂是不分籍貫的，如海峽對岸的朱德、葉劍英都是雲南講武堂的學生。祇是辛亥革命成功之後，不但中央政府（清廷）垮了，地方政府也垮了。代表清廷的外省人走的走了，死的死了。說真的，在滇革命志士，並非光是「雲南人」。

第一位吃到革命果實的人，應該是蔡鍔，他是湖南人，並非雲南土產。蔡鍔雖然是日本士官生，却不是唐繼堯的同班同學。蔡鍔是唐繼堯的學長，唐繼堯是沒有可能提拔蔡將軍的，因爲唐繼堯沒有粘上清廷權力的「邊」。

蔡鍔既非雲南人，爲什麼會到雲南效忠清廷呢？原來羅佩金這位士官生，也在雲南充任非帶兵官，被滇督李經羲派到上海洽購軍火；適蔡鍔在廣西失志，跑到上海賦閒，碰到羅佩金；同學都有互相照應的老行規，羅佩金去電昆明，向李經羲推薦獲准。蔡鍔初任管帶，繼經李經羲提携，接任王振畿的第三十七協之統領（旅長）。在當

中 外 雜 誌

時留日回國任軍職的，以蔡鏜的職位最高。

留日學生大半是開革命的志士，蔡鏜受到「革命不談省籍」之所賜，便被在滇留日武學生視爲老大哥。如果當時祇搞「本土化」，蔡鏜怎會受本地同學的支持呢？假使當日大家不以國家爲重，蔡鏜也不可能遠去雲南搞護國。可見革命與國家，思想與潮流，搞政治的人，不可不研究其間的道理。

我們的意思是說，唐繼堯雖然是雲南人，清廷的雲南當局，並未重用他帶兵。就是蔡鏜入滇，飛黃騰達，也非唐繼堯所能過問。反過來說，唐繼堯之「將有大任」，恐怕不是「異徵」可以說明，倒是「異志」（反骨）促成了他的努力用心。

他的努力用心，使他秋操得獎。  
他的努力用心，使他深信民族主義，宣傳革命，有膽有識，立志報國。

他的努力用心，使蔡鏜在今後的事業上，對唐繼堯另眼相看，存心提拔。

當時在雲南鬧革命的軍人，當然以老大哥蔡鏜爲中心，謝汝翼、李根源、黃毓英、羅佩金、沈汪度這些士官生都是推動革命的領袖人物。他們的國是意見是——清廷腐敗，國事不綱，內憂外患，互爲因果，非推翻專制政體，不足以挽救中國。又說雲南處於英法兩強之間，危亡無日，應該激勵民族意識。當時，不僅軍人知道有人要革命，一般社會青年和知識分子，也蓄意改革。真是「革命欲來風滿樓」，雲南人心已處於「變在旦夕」的時刻。

## 辛亥火花激發共識

辛亥年八月十九日（十月十日）革命的火花，在武昌開始爆炸，不但清廷亂了手脚，就是各地的革命分子也是緊張刺激，忙着響應變局。蔡鏜等滇省新軍軍官也在唐繼堯私宅秘密會議，研議如何響應起義。意見當然複雜，有人甚至說恐怕英法出兵干預革命。

但是，他們終於達成儘速起義，可以影響西南各省提前起義；直搗燕雲，飲馬蘆溝，一瀉數百年韃虜亡國之恥的共識。

結論是在九月九日（陰曆，重陽節）起兵響應，奪取清廷在滇政權，自組革命政府。

公推蔡鏜爲總指揮；兵分兩路，攻取昆明。

駐紮東南郊巫家壩的蔡鏜和謝汝翼率步兵進入昆明城，直攻軍械局。駐紮北郊的砲兵，由唐繼堯、李根源、庾恩賜、劉祖武率領，從北較場入城，進攻總督府；並由沈汪度率雲南講武堂學生開城門迎接。

事變之前，雖然謠傳紛紜，清廷駐滇大員，並未動搖，因爲他們認爲新軍還是鎮壓暴亂的工具，足以消滅任何反叛。誰知禍起蕭牆，清廷辛苦經營的新軍，正是響應辛亥革命的隊伍。所以，除了響應之初，略有警衛人員的死傷外，一千多人的雲貴總督衙門警衛都棄械投降。

但是，戰事雖不劇烈，意義却非常重大：

一、數千年的一姓一氏之專制政體，被軍人推翻了。新建立的政權，雖然根絕了世襲的政權移轉方式，但却變成新時代軍人干政的開端。文

人或政治家成了兵家的附庸。

二、雲南響應辛亥革命，號稱「首先響應」，自然分享辛亥革命的光榮，也是一個足資紀念的事件，所以稱爲「雲南光復」。但是，却沒有舉辦選舉或地方自治，除了推光復雲南的新軍領導人蔡鏜充任雲南都督之外，民權思想並不發達。

三、由於光復雲南之時，北洋系在雲南的軍頭爲靳雲鵬、鍾麟同等人，不是被殺，便是逃走了。北洋系軍人在雲南的勢力，完全瓦解；由蔡鏜、唐繼堯等「革命小將」接掌大權，造成此後北洋軍閥當道、雲南可以舉足輕重的態勢；也是蔡鏜及唐繼堯「突現」中國政治舞臺的主因。「槍桿子下出政權」的現代原由，也起始於此。後來孫中山先生力主創設軍校，共產黨武裝山頭，北洋軍閥堅持武力統一全國，都是「槍桿子下出政權」的產物，也就是一切仰仗軍人。

## 未見統一飲恨而亡

四、唐繼堯應該是一位澈底覺悟的軍人——在多次動武之後，他深悟中國之大，猶如美國。中國民主應以美國的「聯邦制」爲藍圖，因而倡導「聯省自治」，組成一個內爲民主，外爲國防外交統一的強大國家；不要再打（內戰）了。但是，誰放得下「武裝統一中國」的傳統擔子？到了今天還在爲如何統一國家而大傷腦筋。所以，唐繼堯飲恨而亡，祇能怪中國太大，世界政治思潮太龐雜。恐怕到了唐繼堯的曾孫輩，才能見到和平統一的曙光。

## 雲南是共和的淨土

清末民初的大人先生們，喜歡用「共和」二字；現在的「學者專家」們則幾乎無人用「共和」字樣，而改用「民主」了。事實上「推翻滿清」，並不等於民主共和的誕生，袁世凱稱帝與軍閥割據，是反共和反民主。「共和」是中國民主政治的「初步階段」——沒有那個時期的共和理想，今天的中國民主實質，會是什麼樣子？誰也不能預料；因為民主也是多樣化，英國的民主方式，就不同美國；中國民主政治應該走那一條路呢？這不是書生論政的問題，應該是民主也有一個「歷史的框框」，後來的人很難不受這個「框框」的影響。雲南在中國民主運動史上被忽略或被抹殺了，不能說不是一個「革命的疏失」，使中國民主走了很多「冤枉路」，便是一個明顯的史實。讀史的人，難免不作「前事不忘，後事之師」的興歎。

在推翻滿清專制政體的革命行動上，雲南的少壯軍人蔡錕、唐繼堯、謝汝翼、李根源、黃毓英、羅佩金、沈汪度等所發動的「軍事政變」——辛亥年九月九日重陽節的雲南光復，剷除舊勢力，最為徹底。

這不是殺人多少的問題，而是清廷在雲南的兩股力量，都被「射人先射馬」，徹底粉碎了。清廷在雲南的兩股勢力一是八國聯軍之後，清廷的「明理人」，亟思振作，先後派了振鐸、錫良、李經羲等大員相繼督滇。這些大員確有「銳意改革」的抱負，深得各方的擁護，影響力之

大，不是一般昏庸貪瀆之輩所能望其項背；在雲南自然有一種不可輕視的「聲望」，大有中興的氣象。一是丁振鐸等的「新政」在雲南創辦「講武堂」（軍校），採取「就地取材，成立新軍」外防英緬法越入侵，內則鎮壓革命。

成立新軍師法日本。為什麼師法日本呢？以今天的話來說：「日本能，我們也能」；因為日本明治維新之後，取法西洋成功，我們理當跟隨日本如何「取法」西洋。同時，威脅雲南的強鄰是英法不是日本——日本人是黃皮膚呀！他們擊敗白人的帝俄，對雲南人防英防法，是一種鼓勵。雖然甲午之役，我國敗於日本，但是中日同文同種，因此，掀起了「日本熱」。可是，雲南的新軍，是北洋軍的系統，也是後來阻礙中國民主運動的袁世凱及北洋軍閥的同一派系。

辛亥革命是因袁世凱的和平「逼宮」，才造成清室的遜位。但是，雲南新軍的響應武昌起義，就不是那麼簡單了。以蔡錕為首的光復雲南，不但趕走了「末代總督」（事實上蔡錕網開一面，放走了雲南總督李經羲的肉身），瓦解了清廷在滇的主權；北洋軍系統的軍事將領，斬雲鵬、曲同豐、鍾麟同的勢力，也被光復部隊一掃而光。從此之後，不僅遜清無從在雲南復辟，就是威鎮全國的北洋軍閥，也無從在雲南與風作浪了。雲南光復之後，在辛亥年的九月九日下午，也就是響應武昌起義的軍事政變當天，舉行革命軍官會議，公推領導人蔡錕為「都督」（民國省級軍政府首長）。

都督府設於昆明的五華山，下設軍政、軍務

、參謀三部，儼然為一個軍政府。唐繼堯在這個軍政府之內擔任軍政及參謀兩部的次長，仍兼講武堂的總辦。可見唐繼堯也是光復雲南前的在事人員，又在雲南光復後充任要職。說者謂光復雲南的軍事政變，社會秩序安定，為各省所僅見——也就是沒有擾民，都要歸功於領導諸君子的事前籌畫周密，進行革命時才會井然有序。

其實，雲南光復之役，並非十分順利。蔡錕曾令李根源帶兵到滇西平亂。滇南的蒙自也發生兵變，法國帝國主義者便以保護滇越鐵路為藉口，要出兵雲南，頗有威脅中國民主革命的顧慮。唐繼堯在法帝進逼的情形下，擔任什麼角色呢？唐繼堯在革命之後充任軍政及參謀兩部的次長，因他是講武堂的總辦，有的是持槍羣衆。當時的軍事教育，分陸軍小學及講武堂兩級，都是未來軍中的下級幹部。唐繼堯便得蔡錕的指示，率領這兩級的師生，進駐滇越鐵路各站。名為保護鐵路，實則防止法帝進兵中國，干預我國民主革命。用「軍校師生」護路，防止法帝的藉口，這一招實在做得漂亮；不然「外患相逼，影響時局至鉅。」

從推翻滿清的專制中，唐繼堯的表現，實在得到蔡錕的欣賞。「龍上天還要一棵彎腰樹」（雲南諺語），唐繼堯怎會平步青雲呢？在衆將校擁護之下，蔡錕做了光復雲南的領導人，也在蔡錕的任用下，唐繼堯便在衆將校中，出人頭地。我們不相信沒有人提拔，唐繼堯會自動陞官。

這裏所說的「提拔」，當然不是世俗的偏私任用，而是在同志中，蔡錕看中了唐繼堯，任命

唐繼堯 爲雲南北伐軍總司令。

### 策劃掃除專制遺孽

雲南已經光復（推翻專制）了，爲什麼還要北伐呢？「伐」什麼人呢？原來清廷遜位，並非直接受脅於「革命軍」，而是北洋系軍頭。反過來說，北洋系軍人，原係清廷訓練的新軍，其威力可以防禦外侮，也可以鎮壓革命。運用這批軍人，既可假借革命之名，勸脅清室退位，當然也可以假借任何名義，壓迫欠缺武裝力量的革命黨人就範。事實的確如此——臨時大總統孫文，不是讓位給袁世凱了嗎？推翻專制的革命黨人，多半醉心問鼎中原空談政治理論。實際上都是一批書生之見，沒有什麼政治藝術可言。

蔡鍔和唐繼堯等好多留日的士官生，他們都是清一色的孫中山先生的信徒，也就是狂熱的民主信仰者，他們不是同盟會的會員，也是國民黨的一分子。可是，在他們徹底掃蕩清廷在雲南的政治勢力，解除北洋系在雲南全部將領的軍職之後，雲南應該是推翻專制後的一片共和淨土——因爲既無專制餘孽，也沒有軍閥的禍根，唯一缺乏的就是共和革命的正確領導。

治革命史的人，如果忘了雲南是「辛亥」之後一片共和淨土的史實，怎能稱之爲「良史」呢？這不是我們鼓勵今人，厚誣古人；也不是當時的革命家明知故犯，而是「由點及面」的理論，到了後來才被完成。但是，輕輕易易的放棄這塊共和革命時代淨土，才會使中國的統一運動，到今天還是不易完成。我們可以這樣了解，雲南推

翻專制的前後，深具全國性聲望的革命家，有誰到雲南鼓吹革命？控制革命？導引革命於正途？我們答案是「沒有」！不過任憑蔡鍔、唐繼堯在那裏「搞搞」而已。

蔡鍔在軍官會議上被推爲民國的「督軍」，組成了軍政府，並沒有積極籌畫推行「地方自治」（省縣鄉鎮首長及議員的選舉），也沒有標榜「共和模範省」的雄心。蔡鍔和他的同志，依然是傳統的僚屬關係；他們對「共和」祇有模糊的觀念，認爲祇要推翻了滿清，便獲得革命的成功，便可天下太平了；所以他們寄望的是有一個「合法的」中央政府。

用軍權及詭計逼走孫中山的袁世凱，算不算「合法的」呢？袁世凱出任「大總統」，算不算民國基業已固呢？這些問題，史實作了否定的答覆。奇怪的是國民黨人及蔡鍔等人至死不悟——雲南是一塊共和淨土。他們完全沒有建設雲南的平常心，大家做的是「飲馬蘆溝」、「會師燕雲」的美夢。我們要問：「爲了民主共和」，蔡鍔和唐繼堯這批新貴在雲南做些什麼「紮根」的工作？他們唯一的想法和做法便是「出兵」去「響應」或「應援」。

日本或外國學者說：辛亥革命不過是偶發事件。當然，國人聽到這樣的評語，心裏着實不舒服。但是，我們打過比方，說辛亥革命不像七十二烈士的廣州之役，有謀畫、有步驟的去進行革命，大家就會覺悟清廷之所以無反抗之力，立即遜位，就不能說「不與」袁世凱的謀略有關了。

袁世凱出任清廷內閣之後，即刻派馮國璋率

師南下，攻克漢陽。用今天的話來說，便是阻碍革命；造成革命大勢岌岌可危。換言之，宣佈響應武昌起義，推翻滿清專制各省，祇好商議組織聯軍，大舉北伐。祇是「伐」的不是滿清，而是滿清的北洋新軍——正是以袁世凱爲首的這批專制遺孽。這是辛亥革命的插曲嗎？應是袁世凱謀國稱帝的「伏筆」。假如袁世凱不派馮國璋南下，顯顯他的軍威，孫中山先生的臨時大總統，未必拱手「讓賢」，可見袁世凱才是近世槍桿子下出政權的祖師。就在武昌起義，清廷啓用袁世凱組閣，派兵攻佔漢陽，響應武昌起義各省籌組北伐軍之時，蔡鍔爲首的雲南革命羣雄，也召開軍事會議，決議出兵應援各省北伐部隊。

雲南軍事會議推唐繼堯爲雲南北伐軍總司令，準備會合四川的「革命軍」，出師武漢，應援武昌起義的革命軍。誰也沒有料到，袁世凱正玩弄着「一石二鳥」的計謀——一邊嚇唬革命黨人，一邊「軟逼」清室遜位；袁世凱顯然是披着共和外衣的狼，祇是當時的大多數人沒有提高警覺而已。「天下」既然走向共和，南北議和，北伐也就不必「伐」了。但是，這個「總司令」對唐繼堯來說，非常重要。因爲這位革命政府（雲南）裏的參謀及軍政兩部次長，可以有兵權了。同時，唐繼堯在此後的獨立行動中，也可一展長才。今天，雲南人還在敬稱唐繼堯爲「唐公」，應該從此開始。後來蔡鍔與唐繼堯，以「蔡唐二公」並列，也應該有其原因；但是，都與唐繼堯被推爲「響應武昌起義」的「雲南北伐軍總司令」有直接關係。（未完待續）